

郭沫若 研究

12

文化艺术出版社

郭沫若研究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郭沫若研究》编辑部编

12

文化艺术出版社

郭沫若研究

第12辑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郭沫若研究》编辑部 编

*

五联书店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23,000

1998年6月北京第1版 199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1743-1/J·275

定 价：18.00 元

目 录

纪念《甲申三百年祭》

发表 50 周年

米脂话《甲申》·····	黄 烈(3)
应当如何评价《甲申三百年祭》·····	叶桂生(7)
还其本来面目 ·····	谢保成(22)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	施 丁(40)
——读《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启示录提要 ·····	李生奎(62)
《甲申三百年祭》两次风波述评 ·····	张剑平(71)

“郭沫若与中国当代文化”

学术研讨会

郭沫若与鲁迅的儒学观比较论 ·····	贾锡信 邱文治(88)
论郭沫若纪游诗文的深厚内涵·····	黄侯兴(106)
论郭沫若的旅游文学创作·····	周靖波(116)
论郭沫若与巴蜀文化·····	李 怡(125)
历史意识与当代意义·····	蔡 震(143)
——论郭沫若的当代性	

“郭沫若与当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 钟作英(159)

文学研究

试论郭沫若在 1916 年的文学缘起 顾圣皓(166)

启蒙的“战叫”..... 王卫国(181)

——论《女神》的悲剧精神

《凤凰涅槃》新论..... 张建宏(191)

悲剧再生：民族精神的最强音 郑闽江(211)

——郭沫若历史剧的特殊贡献

郭沫若“漂泊小说”选序..... 邓牛顿(226)

泰戈尔对郭沫若诗论及创作的影响..... 周 红(232)

“创造社现象”的青年学分析..... 魏 建(248)

书信·佚文

致郁文(一函) 郭沫若(266)

致广元县政府文化方面负责同志(一函) 郭沫若(267)

致广元人民委员会(一函) 郭沫若(268)

致铃木丑之助(一函) 郭沫若(269)

致进藤一马(一函) 郭沫若(270)

集外诗三首..... 郭沫若(271)

立春前夜话撒豆..... 郭沫若(273)

国外研究

回忆郭沫若..... [日]田中忠夫(283)

田家农 译

试论“五四”文学中的个性与主观性问题

..... [德]英葛·谢飞(292)

晨 雨 译

**纪念《甲申三百年祭》
发表 50 周年**

米脂话《甲申》

黄 烈

过去治学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叫做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这次《甲申三百年祭》学术讨论会在米脂召开就有着研究与考察的双重意义。

回顾《甲申》一文的发表已整整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背景完全不同了，这篇文章当年的时代意义当然不适用于今天，但作为历史的回顾和学术的探讨，对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来说仍是有意义的。

大家知道郭老是先秦史和古文字学的大师，对明史并没有很深的研究，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如果只注意其政治意义而忽视其学术价值，那么时过境迁，也就没什么可说了，今天还要讨论，说明它是有学术价值的。

1944年恰逢明朝灭亡三百周年，在重庆，由党所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决定组织一组纪念明亡三百周年的文章。这个选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是清楚的，但从哪个方向来表现其意义就并不很清楚了。当时郭沫若、柳亚子等人应约撰稿，郭文发表在《新华日报》，柳文发表在《群众周刊》，两篇文章在

如何评价李自成和明政府上就很不相同。让我们先看柳文中的一段，他说：“李自成虽然占领了北都，逼死了威宗（思宗），但不能从政治上着手改革，现状趋于混乱……这样朱氏和李氏两败俱丧，而满清坐收渔人之利。”柳文对农民战争的正义性并没有肯定，认为只不过是朱氏和李氏两家争天下，用“逼死威宗”似乎对崇祯上吊还有几分惋惜。而郭沫若的文章就不同了，第一，旗帜鲜明地揭露了明朝的腐朽统治，包括崇祯的伪善面孔，客观地说明了社会危机，官逼民反，不亡何待；第二，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了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正义性，这在当时确实是耳目一新；第三，客观地总结了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多方面的教训。

郭文发表后引起了绝然相反的极大反响。重庆国民党的报刊群起攻击，说郭文是什么“亡国思想的代表”，“鼓吹战败主义”等等，大骂李自成是“民族的罪人”。在革命的阵营则高度赞扬了郭文，给予极高的评价。不过并没有把郭文为农民起义翻案放在重要位置，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这一问题早有明确的答案，面对现实，革命队伍要求警惕自己的弱点，因而把注意力放在李自成由胜利转向失败的教训方面。3月22日郭文在重庆《新华日报》刊载完后，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演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从延安写信给郭沫若再次高度赞扬了郭沫若史论和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

作为学术著作的《甲申三百年祭》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作了奠基和示范，它本身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是不可磨灭的。这一著作并不是一挥而就的应世之作，而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和深厚的史学基础。郭沫若从他幼年开始，他的同情心一直是在受压

迫受剥削的农民方面。1919年五四运动，郭沫若写了《匪徒颂》诗歌，虽未涉及中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但他为被称之为匪徒的革命者正名，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写《匪徒颂》后不久，1922年在《大地之号》的诗篇中呼唤：有陈胜吴广第二出现。1928年在《想起了陈涉吴广》的诗篇中，热情歌颂了农民暴动的先驱者陈胜吴广。如果说郭沫若早年对农民和农民起义的歌颂还只是质朴的同情心，当他成为一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深厚史学功底的史学家以后，他对农民起义性质的认识就产生了质的飞跃，《甲申三百年祭》就是一次质的飞跃的结晶，尽管他还存在一些小的失误，但不能与巨大的成功相比，颠倒过来而大加攻击是不公正的。

郭沫若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文风，使他的一些史学著作带有现实意义。《甲申》一文帮助了解放区的整风，但他的文章的初意并非为整风而作，他本着史实总结的李自成等由胜利转向失败的教训亦非仅为骄傲一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 领导层沉沦于胜利的骄傲。郭文指出：“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撙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

2. 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李自成等在进城之前似乎没有根据形势做出有针对性的各种政策和策略，对于踞守山海关的吴三桂这样一个机会主义者没有加以笼络以防北边大敌，刘宗敏却反其道而行，绑其父，索其妾。郭沫若称“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

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对明朝宗室和降官的处理也无一定之规，听牛金星、刘宗敏等人各行其是。

3. 军队纪律败坏，严重脱离群众。李自成的农民军本以纪律严明著称。进北京后却把几十万士兵屯积京城，尽情享乐，军纪败坏，骚扰百姓，大失民望。

4. 领导层互相猜疑，不能团结一致。郭沫若特别描写了李岩这样一位自成军中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从他给自成所上疏谏四事中可以看出，他对农民军进北京后的弊端是很清楚的，可惜自成不但未加采纳，其后反而听信牛金星谗言，置李岩于死地。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竟如此瓦解了。

郭沫若还客观地指出旧式的农民革命最后结局必然是以失败或变质而告终，但败得如此之快，就应归之于本身的错误了。

350 年的时光已经流逝，我们今天加以回味，天上人间已不可比，但历史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教训，最主要有两条：1.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社会的根本问题，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如此。当前一些城市问题其根源也是农民问题，如果不很好解决农民问题，是会出大问题的。2. 明亡和农民军之亡都与本身的腐败密切关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腐败这一毒瘤，不管是出现在什么样的时代，它都会破坏社会的稳定，甚至导致政权的灭亡。今天在党的领导下与腐败现象作斗争，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自明的。

应当如何评价《甲申三百年祭》

叶 桂 生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在 40 年代的特殊条件下撰写的。时代使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十年来，它一直受到广大的、进步的学者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甲申三百年祭》的功绩已经载入新史学的名册。今年，正值该文发表 50 周年，应该祝贺。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看到此文，非常重视。他大力表彰了作者的才华，特别把此文印发给全党的干部，作为整风文件来对待。他指出：“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① 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毛泽东又着重提到：“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还鼓励郭沫若多为人民利益而写作。他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② 新中国成立的前后，毛泽东还曾多次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目前，国家正在进行有中国特色

① 《学习与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② 《致郭沫若》1944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

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江泽民在多次重要会议上又谈到要重温这篇史论，意义更为深远。郭沫若曾在此文中写到：“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撙节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①不久，大顺王朝土崩瓦解，农民革命终于彻底失败。这是历史给予的一场悲剧，永远值得人们回味。

从史学史的角度看，《甲申三百年祭》是历来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自1978年起，陆续登载文章达40余篇，对于该文进行评述。1981年，还有个别的专家直接对郭文提出非议，企图一举否定它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成就，曾一时相互辩争。当然，这种意见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当前，阐发《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经验教训时，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有的专家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比如，今年2月23日，《光明日报》曾召开“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50周年学术座谈会”。会议“纪要”中提到该文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战争的研究处于领先的和指导的地位。有人说：“在历史学上，郭沫若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李自成起义，为明末农民战争以至整个古代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翻了案，为新史学开辟了道路。”有人说：“《甲申三百年祭》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开山之作。”还有人说：“从理论上，这篇文章提出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一些

^① 《甲申三百年祭》，《沫若文集》第12卷。

基本的、重要的论点，构成了建国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① 这里，极其鲜明地抬出专家的立论观点。他们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开辟了道路”、“开山之作”和“基本理论框架”。再简单明了地说，该文达到了三个“第一”。对于这样一些重大的结论，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应当如何评定呢？我想，只能心平气和地利用史料来说话。这样做是更好地学习和纪念这篇佳作，发扬郭老的求实精神，并活跃学术研究气氛。

早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叙述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十分重视从奴隶制变成封建制的变革。他曾断言，当时的兵器本是铜器，而耕种的锄头“却是铁器”。他说：“陈涉吴广以铁的锄头举事，这是等于以铁器去征服铜器时代的秦兵。所以一些农民佚徒、浪子流氓终究把秦朝的大兵大将克服了，这不是很有趣味的一个插话吗！”^② 这是明确地表示对刚刚兴起的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与战争的关切。但是，直至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之前，郭沫若没有拿出精力来具体阐述农民起义的有关问题，表明他的观点。

那么，这一段，整个新史学的状况究竟是如何呢？从重庆和延安的史学活动得知，1939年以前，进步的学者除了撰写有关论著之外，大体上是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或争鸣：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与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缓慢性与长期性、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以及中国近代的若干问题。同时，这时期，还批判复古主义史学、外力史观、文化形态与英雄史观。1939

① 《光明日报》1994年3月14日第3版。

②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新书店1930年版。

年12月，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并逐渐为进步学者所知晓。该书的第一章“中国社会”简略地概括了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着重论证了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若干问题，其中，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与战争的论述是一个重要部分。毛泽东第一次把历代的农民革命斗争提到应有的高度，这就必然促进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40年代的最初几年，即1943年以前，显然是有所成就的。

一、有的撰写方法论的文章已经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王子野的《研究历史的锁钥——唯物史观的笔记》（1940年6月）认为，唯物史观的第一要点是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它发现了社会存在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又会引起社会革命，而制度就是在这种革命中接受变革，社会向前进步。所以，作者认为：“我们只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还不够，进一步还得承认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原因。”^①因此，阐发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是历史学的重大课题。吕振羽在《“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1940年10月）中，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迟缓的基本原因有四条，其中第一条是农民战争问题。他说：“农民为了逃避残酷的剥削、压迫和获得土地，便在农民战争、民族战争过程中和其失败后，以至在平时，大量人口不断向落后民族地区和四周移徙。”他认为：“而每次的大规模移徙，又都是与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相关联，与农民战争或民

^① 王子野：《研究历史的锁钥》，载《群众》第4卷第16、17期，1940年6月20日。

族战争失败后的统治阶级的屠杀或他族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相关联，与地主阶级的内战而使农民无法生活相关联。”^① 农民战争问题自然就提到日程上来。我们知道，1945年，郭沫若曾应邀去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0周年的纪念活动。8月，他曾在对外文协历史哲学组作了《战时中国历史研究》的报告。他介绍重庆和延安学者的史学状况，其中，普遍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长久。郭说：“学者——历史学家们开始研究了整个中国历史上所常见的农民革命。中国历史上充满了不断的大规模的农民革命。为什么每次农民革命终归失败，而即使胜利，也没有改变社会的基础？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农民革命为什么不曾得到胜利，这问题也就是中国封建制度为什么不能自行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② 郭沫若的这段叙述，正好说明了当时有不少的学者已经重视这一问题，而郭本人恰恰是对于“迟缓性”和“长期性”很少发表过意见。还有，有人直接提出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关心。陈家康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1943年1月）中，评述了吴泽这本书，并且说：“把封建制度下农民战争认为是社会革命的动力，更无异议。而且为了更联系实践起见，我们号召用新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朋友们，今后应当加强对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史，以及对于历代农民战争的研究，以便使我们新史学体系的重心不致局限于古代一隅。”^③ 他这里讲的“体系重心”是平常人们关心的古史分期问题。他要

① 吕振羽：《“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3期，1940年10月15日转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② 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载《中国学术》季刊第1卷1946年8月1日。

③ 《新华日报》1943年1月25日第4版。